

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莞市的调查^①

汪传艳

摘要:通过对东莞市农民工的调查,本文采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个体异质特征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是否拥有责任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农业背景、务工背景因素及受教育程度因素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农民工作为同质群体在教育行为选择上具有趋同性。政府应通过提高农民工收入、建立多元化、多层次教育培训体系、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

关键词:农民工 教育培训 影响因素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收入问题和转移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 年农业部、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发的《2003 - 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明确指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再次强调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因此,探究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成为继农民工“准入问题”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德·布劳等人(De Brauw et al., 2002:329 - 353)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教育投资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罗忠勇,2010;刘万霞,2011)。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待遇也使农民工意识到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参加教育培训的主观意愿强烈(刘平青、姜长云,2005;刘长海、杜时忠,2009)。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如杨晓军、陈浩(2008)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有直接影响。黄乾(2008)利用上海等 5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培训需求受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张秋林、张晔林(2008)采用赫克曼两阶段估计法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决策过程分为“是否愿意接受培训”和“愿意投入的规模”两个阶段,指出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受其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培训项目特征等因素共同的影响。丁煜等人(2011)的调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显著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的被解释变量是“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但农民工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文凭社会里,学历仍是农民工进入主流职业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学历教育表现了较高的需求,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教育培训意愿”包括参与学历教育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变迁研究”(编号 AHA090003)。

或技能培训意愿两类。此外,已有研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性,缺乏科学的标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劳动者个体特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西奥多·舒尔茨,1990)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认为,社会身份背景是决定每个人教育意愿的重要因素(Duncan Featherman and Duncan, 1968)。鉴此,本文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群体身份特征角度探析农民工特征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新生代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农民工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表1 农民工基本情况描述(N=332)

类别	比例	类别	比例	类别	比例
平均年龄(岁)	25.0	外出务工情况		是否有责任田	
平均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岁)	19.3	初中毕业后进城	12.8	有	35.9
性别		高中毕业后进城	67.1	没有	64.1
男	22.4	在家务农后进城	12.8	对农业劳动	
女	77.6	随父母在城市长大	7.3	很熟悉	21.8
受教育程度		在外务工多少年		偶尔从事过	59.7
小学	1.2	不到1年	6.0	从来没从事过	18.5
初中	15.0	1至3年	35.8	月收入	
高中或中专	70.2	4至6年	30.4	1000-1500元	9.1
大专及以上	13.6	7至9年	18.7	1501-2000元	32.7
婚姻		10年以上	9.1	2001-3000元	41.2
未婚	69.6	换工作次数		3000元以上	17.0
已婚	29.2	没换过	19.0	目前所在行业	
离异	1.2	1-2次	36.9	服务业	17.6
再婚	0	3-5次	40.2	制造业	58.8
收入满意度		6-9次	3.0	建筑业	3.0
满意	32.2	10次及以上	0.9	交通运输业	2.7
不太满意	53.3			其他	17.9
很不满意	14.5				

(二)变量设定

1. 因变量

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

$$F(Y) = p^Y(1-p)^{1-Y}; Y=0, 1$$

本文采用 Logistic 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 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_i = F\left(\alpha + \sum_{j=1}^m \beta_j x_{ij} + \mu\right) = 1 / \left\{ 1 + \exp \left[-\left(\alpha + \sum_{j=1}^m \beta_j x_{ij} + \mu\right) \right] \right\}$$

其中, P_i 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 i 为农民工编号, β_j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j 为影响因素编号, m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x_{ij} 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 α 为截距项, μ 为误差项。

2. 自变量及研究假设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第一,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

第二,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教育程度。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可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

第三,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是处于边缘地区、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以后选择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主要决定因素。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

第四,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从事高技术含量的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认为不需要。在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群体中,56.6%的农民工选择“学历教育”,选择“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43.4%,表明农民工更偏向学历教育。这一结论虽与诸多学者及政府的主观印象不同,但却符合东莞市农民工教育培训市场的现实状况。在对“参加教育或培训的主要动机(多选)”一问题的考查中,“获取学历文凭”是农民工的最主要动机,67.4%的农民工选择此项,选择“胜任工作”、“职务晋

升”的分别占 51.7% 和 43.2%，这进一步印证了“农民工更偏向学历教育”的结论。

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表示愿意每年投资 1000 元以下,23.9%的表示每年愿意投资 1000-2000 元,48.8%的每年愿意投资 2000 元以上。而从农民工的收入情况看,扣除必须缴纳的社会保险、税金等后,83%的农民工月净收入在 3000 元之下。可见,农民工愿意投资到人力资本上的资金占到总收入的相当比重,对教育培训表现了高度的重视。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 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 17-21 岁年龄段的 90 后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 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 12.833,表明 90 后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 11 倍。处于 22-31 岁年龄段的 80 后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 0.05 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 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主要是刚刚跨出校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 0.012,回归系数为 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 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 2.67 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 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 0.967,表明了农民工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相关分析也表明,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r = -0.065, p = 0.192$)。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 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故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对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点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

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以上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处于2001-3000元之间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1000-1500元收入段提高了约8倍。处于3000元以上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发生率比1000-1500元收入段的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

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表2 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Wald卡方值	显著水平	发生比率
实际年龄(32岁以上)					
17-21岁	2.552	1.243	4.215	0.040	12.833
22-31岁	1.279	0.902	2.013	0.156	3.594
初次外出务工年龄	0.390	0.160	5.961	0.015	1.478
性别(男)	1.301	0.520	6.261	0.012	3.673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0.007	0.619	0.000	0.990	0.993
大专及以上	-0.035	0.854	0.002	0.967	0.966
婚姻状况(已婚)					
未婚	0.828	0.556	2.221	0.136	2.289
离异或再婚	-5.450	1.574	11.997	0.001	0.004
责任田(有)	-0.864	0.512	2.851	0.091	0.421
农业劳动(很熟悉)					
偶尔从事过	-1.256	0.656	3.666	0.056	0.285
从未从事过	-1.471	0.814	3.267	0.071	0.230
外出务工年限	0.377	0.306	1.510	0.219	1.457
换工作次数	-0.165	0.293	0.316	0.574	0.848
行业(服务业)					
制造业	-0.390	0.594	0.432	0.511	0.677
建筑业	-0.815	1.091	0.599	0.455	0.442
交通运输业	-0.762	1.304	0.341	0.559	0.467
其它行业	0.892	0.812	1.208	0.272	2.441
月收入(1000-1500元)					
1501-2000元	0.592	0.669	0.784	0.376	1.808
2001-3000元	2.275	0.808	7.924	0.005	9.725
3000元以上	2.144	0.970	4.882	0.027	8.530
工作满意度(很不满意)					
满意	1.504	0.688	4.782	0.029	4.499
不太满意	0.947	0.541	3.060	0.080	2.578
-2log likelihood 162.586 Cox & Snell R Square 0.142 Nagelkerke R Square 0.287 Sig = 0.001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参照组的发生比率默认为1。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 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施耐德等人(Schneider et al., 1998:462-470)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

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然而,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和培训又是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收入的主要途径。不少学者利用明瑟模型测算了我国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得出了一致结论:教育投资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也有较高的回报率。如罗忠勇(2010)测算珠三角农民工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4.4%,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比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可以多获得6.1%的工资回报。可见,“收入”与“教育培训意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提高农民工收入,可增强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进而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再次提高。

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务工年限的增加,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435, p=0.000$)。具体而言,务工年限不到1年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1501-2000元收入段,占50%;1至3年的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比重从16.7%提高到39.7%;4至6年的主要集中在2001-3000元,占47.4%;而务工年限在7年以上的,主要集中在3000元以上;务工10年以上的群体则有51.1%的月收入超过3000元。为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务工年限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局面,应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首先,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

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本文通过对东莞市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对学历教育具有较高的需求,甚至超过技能培训。这一结论的推广虽然受到局限,但也说明了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是多样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

具体来讲,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农民工教育培训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应注重教育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对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之前,应对农民工的需求类型进行调查分析,有针对性的提供学习内容,以免出现供求内容不一致、教育资源浪费的情形。在教育机构选择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应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办学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

政府组织农民工培训工程,本意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从现有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户口仍是不少流入地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和补贴的先决性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为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性障碍。首先,将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纳入流入地培训体系内,针对不同层次农民工的不同需求,实现统一规划,分类管理,逐步覆盖。其次,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推进农民工参加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的工作力度,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农民工积极主动提升人力资本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 丁煜、徐延辉、李金星,2011,《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第3期。
-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 黄乾,2008,《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贸研究》第4期。
- 刘平青、姜长云,2005,《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第9期。
- 刘万霞,2011,《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
- 刘长海、杜时忠,2009,《转型期低学历农民工教育需求与供给调查报告》,《教育与经济》第1期。
- 罗忠勇,2010,《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教育与经济》第1期。
- 西奥多·舒尔茨,1990,《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杨晓军、陈浩,2008,《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 张秋林、张晔林,2008,《需求视角下的农民工两阶段主动培训投入影响因素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第8期。
- De Brauw, Alan, Jikun Huang, 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 2002,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Vol. 30(2).
- Duncan O D. Featherman D L. Duncan B, 1968,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Extensions of a Basic Model*.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 Schneider, B. Brent, D, S. Sylvester, T. and John, F. 1998,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s: A Test of the Homogeneity of Personal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83 (3).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陈昕